



□本报记者 洪蔚

汉语中本没有“科学”一词,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时,徐光启从“格物致知”一词中找到了对应,于是两人将西方科学的汉语名定为“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致学”或“格致”、“格物”。一直沿用到20世纪之初。

为科学正名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按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解释,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推究事物的道理。清代学者认为,science 就是“格物致知”,并以为,西方科学中国古已有之。

将 science 定名为格致,充分支持了“西学中源”的思想。“西学中源”萌发于明清之际,后来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提倡。这

史料篇

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而学者傅国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通过这些私人记录,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

散落在私人记录中的历史拼图

□本报记者 杨新美

随着时间的流逝,辛亥革命已被历史的大门锁在了“过往”。很多学者都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对这段过往一窥究竟,看看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终究也只是在大门之外,从间隙中对其窥探。

在辛亥百年之际,历史学者傅国涌跳开了其他研究模式,以直接触摸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即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的方式,推开了尘封百年的那扇历史大门。并写出了《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来“拼凑”这场革命的拼图,让读者直接通过亲历者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来感同身受那段历史的震荡。

“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目标。”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傅国涌再次强调。因此,在该书的上册中,他从“人心”、“世乱”、“报界”、“剪辫”、“易帜”等5个角度切入阐释辛亥革命发生的缘由;而在

对话



□受访者 学者 傅国涌
采访者 本报记者 杨新美

《科学时报》:您曾在讲座中说,自己在写《百年辛亥》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以前人所不知的“辛亥”?

傅国涌:我所发现的这个“辛亥”不是一幅整齐划一、一目了然、黑白分明的图画,而是有点复杂、甚至有点杂乱,也可以说色彩斑斓、内容无比丰富。

这幅画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导演,一个决定性的人物或组织,而是历史按自身逻辑展开自然形成的。换言之,这场革命不是某些人在密室里设计、构想出来,然后进行实施,而是在当时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结果也不是那么称心如

观点篇

种看法,为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然而,这种提法,也使世人将西方科学理解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学问,雕虫小技而已。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解释说:“这种观念在19、20世纪之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严复曾提出批评,认为西学“有体有用”,“西学中源”的观点令人不齿。

“科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说从德语翻译而来,一说从英语来。1897年,康有为在编撰《日本书目志》时,将这两个汉字引入中文。同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将“格致”与“科学”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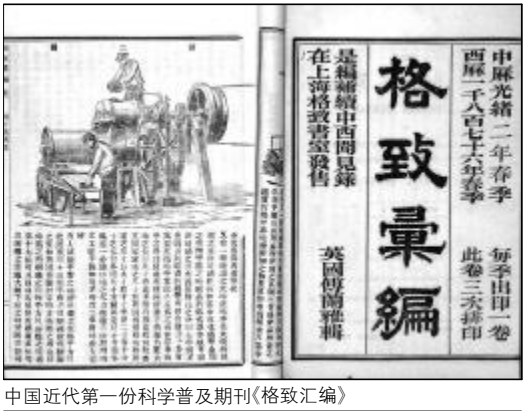
尽管“科学”一词,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前,并开始逐步普及。然而20世纪之初,一直是两词并用、混用的局面,直到辛亥革命后,“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

在王扬宗看来,为“科学”正名,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更是解决了引进西学文化的思想根源。随着“格致”一起消失的是,在认识科学上,中国知识分子抱有的一种阿Q式的荒唐心态——“我们早先……”

在评价“科学”二字的正名时,胡适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在记者以“辛亥革命与科学”为题联系采访时,科学史学家王扬宗额外地做了些“功课”。他说,如今对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很少,也少有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发表,这对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与“科学”混用的“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们管它叫科学……

辛亥革命: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



中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王扬宗说:“为科学正名,从观念上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辛亥稽勋与科学救国

梳理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科学史,在科学活动上,少有何可圈可点的壮举。王扬

宗评价这个时期的科学时认为:“辛亥革命从思想上、人才上、制度上,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蓄了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稽勋局”,对革命功臣进行论功行赏。其中一个“稽勋”的手段,就是遴选、派遣稽勋留学生,资助其赴外留学。

稽勋留学生先后共遴选出3批共一百多人,真正成行的只有前两批,先后50余人。任鸿隽、杨铨(杨杏佛)就在第一批之列。而李四光的名字,则在第二批留学生名单中。

这两批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王扬宗解释说,辛亥前,由于国内的政局、国情,留学生出国后,忧国忧民,学习政治法律的人较多,甚至直接投身革命。辛亥后,由于革命成功,这些留学生则更多地把精力放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傅国涌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

掺杂自己任何点评。“这本书不作价值判断,而是在作事实判断的,自己的价值判断已经悄悄融合在全书的选材、结构、字里行间。”傅国涌说。

“我们受的教育是在看历史尤其是革命史时往往容易理想化,把革命设想得更美好,有拔高和美化,的倾向,所以很难接受赤裸裸的真实。而在历史研究中越是感情色彩浓一些,就越能接近真实面目。”让我们也一同与傅国涌在那些亲历者的文字之中找寻辛亥革命的真相,拼凑这幅历史景象。

财政困难促成的辛亥革命

和所有可以支配的武装,为什么会面对社会变动、谣言四起毫无办法?原因就是人心变了,人们不再相信朝廷的承诺。再加之当时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数百万饥肠辘辘的饥民,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尤其有土壤。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原因,清廷长久以来腐败横暴,失信于民,此时已毫无公信力可言,在信息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他们对谣言自然没有鉴别能力。此外,还有一点,许多谣言可能今天是谣言,过几天就不再是谣言,比如说太原独立、陕西独立、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等等最初都是谣言,隔些日子就成了事实。所以,对谣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场流多少血便得以完成的革命。在《百年辛亥》下册中,您为我们找出了辛亥革命以和谈方式完成民国“创世纪”的关键因素,即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这与以往我们所了解的是有所不同的。何以说这是关键因素?

傅国涌:我也是在长期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才逐渐看清,南北对话,最后以妥协告终,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上台,这是一个多方反复讨论、博弈、磨合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中开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先例。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达成的?南北妥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却是南北双方财政的困难。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困难,学术界已经有多位学者写过论文,也有台湾的学者写过专著,但是对于清廷的困难,特

在学习上,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多起来。

1915年任鸿隽、杨杏佛在美国组建了中国科学社。1914年12月,杨杏佛发表《科学与中国》,几个月之后,任鸿隽发表《论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两篇文章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并倡导科学救国。

尽管杨杏佛的文章还早了几个月,由于影响不及任鸿隽,此后人们多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任鸿隽率先提出的。

“科学救国”一词,出现在同批留学生、中国科学社成员蓝兆乾的文章《科学救国论》中。王扬宗说,尽管科学救国的观念,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几经流变,然而“科学救国”四个字,却是此时才第一次正式提出。

两批稽勋留学生对中国科学的影响,远不止提出一个难题,定名一个口号,而是更为深远的。

王扬宗说,这些留学生,大多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陆续学成回国,我国大学的理工科系,从他们回国后,才真正建立起来,我国的大学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学。“在那以前,我国大学只有预科的水平。”

从那以后,各种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也陆续组建创办起来,中国科学步入了正规发展的轨道。

主义篇

孙中山特别强调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为了求得国家独立,民权主义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民生问题。实施民生主义,是实现中国改造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曾预言,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

□鲁迅雷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1月4日,杭州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当晚攻克杭州,11月5日杭州全城光复。

浙江属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光复会在这里展开了活跃的活动。浙江有三个重要的革命秘密地点:绍兴的大通学堂、嘉兴的温台处会馆、杭州的白云庵。西湖白云庵,位于南屏山之阳,雷峰塔之西,南宋时称为慈庵,虽名为庵,极少佛事。这座在抗战时期遭日军焚毁的白云庵,辛亥革命前夕,正是浙江革命的联络点,属于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之地。这里的绍兴籍老僧智亮及徒弟意周,同情革命,明暗而达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马宗汉、陈伯平、魏兰、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多集于此,密商光复大计。

1912年12月8日,应浙江各界之邀,孙中山自上海赴杭州,专程前来考察,在杭州前后共有5天。其中在12月11日,孙中山特地乘船到白云庵,看望了智亮和意周,并一起合影留念,题写了“明禅达义”的匾额。

此时的孙中山,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半年余,他“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专心于经济建设,致力于铁路事业,俨然是位“铁道部长”。他从1912年至1916年,曾4次来到绍兴、来到杭州,阐述政治思想,指导经济建设,带来丰沛的思想,留下诸多深刻的教诲。他白云庵所题写的“明禅达义”四字,既是对高僧大德的评价,也是一个言简意赅的教诲——“明禅”为本取要义,“达义”为大道理想。

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到杭第二天上午,即去凭吊了秋瑾墓,为鉴湖女侠题写了“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又撰挽秋瑾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752页)这是对巾帼英雄牺牲精神的褒扬。

擅长演说的孙中山,在杭州、浙江等其他地区先后发表各种演讲、讲话不下十次。12月9日,在参加绍兴五十一年一团的特别欢迎大会上,他发表了重要演说,该演说稿收入了《孙中山全集》,这是该次来杭所发表演说唯一收进《孙中山全集》的(详见第二卷第551页)。演讲主题,是阐述民生主义的四大纲:资本、土地、实业、教育。他说:“破坏容易,建设烦难。”他提出:“国有民有,应人人负担义务。”说到民生中的资本,他希望国民自谋生活,“免受富豪之挟制”;而土地则为“人生最要之事,无土地即无立足之所”;在实业中,铁路问题是孙中山先生最为看重的,要求“次第推广”……在这个阶段,孙中山认为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经达到,所以他特别强调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为了求得国家独立,民权主义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民生

作为世界观的科学

作为一次革命,辛亥革命带来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王扬宗说。

作为一次民主革命,辛亥后,专制王朝制度终结,引进了近代宪政制度,为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研机构”。

1913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之所以得以良性发展,“其根本在于现代制度保障”。

蔡元培、胡适评价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制度时,盛赞其为“百年基业”。“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从那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王扬宗说,“因此,当我们反思当今中国科学时,辛亥革命时期,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起点。”

说到反思,王扬宗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在当时的国情、观念下,把科学当做实用手段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占了上风,而科学本身除了实用外,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

在为科学正名后,科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时至今日“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精神不足,也影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问题。实施民生主义,是实现中国改造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曾预言,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

民生为重,但没有好的体制制度的保障,就很难抵达民生主义的理想和理想的民生主义。换言之,如果民生民权不能保障,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保障政体政权。12月10日,在出席共和、民主两党浙江支部欢迎会时,孙中山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主旨是关于政党,演讲核心内容收进了《孙中山年谱长编》(见该书上册754页)。孙中山指出,“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弊端相同;他批评“今之政党,往往争夺政权,不知有在朝党,必有在野党”;他阐明“一旦舆论民心易其向背,则在野党进,而在朝党退”,这样才可“政治日进于文明”。他严词抨击党德“扫地以尽”,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警语:“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迄今教益十分深刻。

民国初年,政权更替,党派林立。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派就有85个;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即达312个。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等纷纷成立。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一共5个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之后,对党务兴趣不大,而是钟情于铁路等民生问题;但他对政党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深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初始阶段的国民党做得并不太好。孙中山的演讲,批评不正常的“党争”,深刻指出“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这里的“党”应该是泛指。“以党亡国”后来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身上得以应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大陆,只好去了台湾,而人民和历史都选择了共产党。

1916年8月16日至26日,孙中山应邀第三次来到杭州,在出席杭州陆军军同胞欢迎宴会上,他发表重要演说,清晰地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方法与路径,再次阐述他在十年前就提出的“五权分立”的构架。

所谓五权分立,“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加入弹劾、考试二种是已”(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46页)。这是个“3+2”模式,是为了“救三权鼎立之弊”。弹劾是监督制衡制度,考试是选拔人才制度,为此,后来设立了监察院和考试院两个机构。而在现代民主国家,是“竞争上位”替代了“考试选拔”,对官员与权力的制约制衡功效更好。演讲中,孙中山对国人喜欢当官有一番深刻的剖析,他说:“吾国人最喜做官,不可其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华人向以官为利藪,不知西人之业工商者,岁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亦寻常之事。若作官虽位至总统,亦不过十余万而已。故若工商发达则致富,即不必为官,为官即不能致富。”

总之,孙中山莅临杭州,通过讲话演讲,带来诸多的教诲,近百年过去,迄今不曾过时。辛亥革命,乃是革命走在改革之前,而孙中山先生既是革命先行者,亦是革命之后的改革先行者。